



歷史路口的抉擇：
1949-1966 年中國大陸檔案學教育發展路徑研究
The Choice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Path of Archival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from 1949 to 1966

張 衍*
Yan Zhang

【摘要 Abstract】

中國大陸檔案學界主流的觀點認為：中國大陸在 1952 年重構檔案學教育時，面臨「一無教員、二無教材、三無經驗」的困境。事實上，自 1934 年到 1949 年間的十六年，民國檔案學教育在辦學機構、教師和專著三個方面給中國大陸留下了頗具規模的檔案學教育資源。但這些不符合預期的檔案學教育資源在初期並未被啟用。中國大陸轉而向蘇聯求援，在蘇聯的幫助下，全盤移植蘇聯檔案學教育模式，而後才開始有選擇的啟用部分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並著手將蘇聯檔案學教育模式「本土化」，打造符合國情的中國大陸檔案學教育體系。

The mainstream view of archival field in mainland China is, when the archival education was reconstructed in 1952, the Chinese mainland faced the dilemma of “no teacher, no textbook and no experience”. In fact, within the 16 years from 1934 to 1949, the archival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left quite a scale of archives education resources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eachers and monographs. However, such resources that deviated from the expected values were not used initially. Chinese mainland turned to the Soviet Union for help, and completely copied the Soviet archive education model with the help of the Soviet Union. After

* 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Shanghai University

E-mail: zy_shu@126.com

then, it began to selectively use some of the archive education resourc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began to localize the Soviet archival education model, creating an education system for archives in mainland China which is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word 關鍵詞

檔案學教育 中國大陸 蘇聯 文華圖專 中國人民大學

Archive education ; Mainland China ;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Boone Library School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壹、前言

據張衍與王梅玲(2016)《中國大陸檔案學碩士教育制度之研究》中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現有 41 所院系開展檔案學教育，其中大學部 34 所、碩士班 31 所、博士班 6 所。從統計數據來看，中國大陸現階段的檔案學教育規模無論是與 1949 年之前的 4 所學校(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文華圖專〕、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社教院〕、江蘇省立江蘇學院〔江蘇學院〕、私立崇實檔案學校〔崇實檔案學校〕)相比，還是與大陸新政權建立之初(1949-1952)的 1 所學校(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檔案班)相較，其辦學的規模與層次均有較大幅度的提升。

1952 年 4 月，中共中央決定委託中國人民大學開辦檔案專業，培養檔案幹部(中國人民大學校史研究叢書編委會，2007)。11 月 15 日，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檔案班正式開學(王景高、馮伯群、李向罡，1993)。1953 年 9 月，中國人民大學校部決定取消由校統管的專修科，把所屬各專業班分歸各系領導。在當時還沒有檔案系的情況下，檔案班擴大為檔案專修科，並繼續招收學員(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人大信管院]，2012)。1955 年 9 月，中國大陸高等教育部決定在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專修科基礎上創建歷史檔案系(王景高等，1993)。這被中國大陸視為新中國檔案學高等教育正式建立的標誌。

從 1949 年 10 月中國大陸新政權的建立到 1966 年是中國大陸檔案學教育重構、調整與發展時期(馬晴，2015)。在這一時期，面對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中國大陸在重構檔案學教育時是如何取用的？1949 年 10 月之後，蘇聯從經濟、制度建設等方面開始大規模援助中國大陸，這一舉措是否對中國大陸檔案學教育的重構產生影響？若有，上述的因素是否對中國大陸檔案學教育的發展路徑產生了合力(resultant force)作用？本文試就上述問題展開討論：文章第一部分回顧民國檔案學教育發展，從檔案學教育系所、師資、專著三個方面展開，試釐清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第二部分探討蘇聯檔案學教育輸入對中國大陸檔案學教育重構產生的影響；第三部分探討中國大陸對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的取用情況；第四部分為結語，總結中國大陸在歷史路口如何重構檔案學教育並探索出一條與實際需求相適應的發展路徑。

貳、民國檔案學教育發展回顧(1934-1949)

一、檔案學教育系所

民國檔案學教育之肇始可以追溯到 1934 年文華圖專檔案管理特種教席之設立。從 1934 年到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臺灣，正規檔案學教育機構，主要有文華圖專、社教院圖書博物館學系、江蘇學院行政管理系、崇實檔案學校等。除此之外，亦有中國檔案函授學

校、四川職業檔案所、中華職業教育社文書補習班、國立中正大學行政管理專業、江西私立劍聲中學職業部高級文書科班 (鄭海濱, 2001), 以及各省、地方的訓練團等講授檔案管理課程或開展檔案人員訓練。

(一) 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

文華圖專首開民國檔案學教育之先河。《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8 卷 1 期的「校聞」中〈試驗新的檔案管理〉報導：

本校自前年 (1934 年) 秋季起增設「中西文檔案管理」二課，對於是項研究，積極進行，不遺餘力。現除大量擴充設備外，並於本年二月起，將本校所有檔案施以科學管理，藉作教學上之試驗。辦理此項工作者為程長源君。程君乃本校畢業同學之一，曾任浙江蘭溪實驗縣政府管卷室主任科員，並以其兩年來所得之經驗，著為《縣政府檔案管理法》一書，版權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購去，不日即可出版云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文華圖專], 2009c, 頁 427)。

檔案管理特種教席的設置與發展，得到了政府的補助。《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6 卷 3 期「校聞」中〈本校迭得補助費〉與 7 卷 3、4 期合刊的「校聞」中〈二十四年度補助費復蒙核定〉分別報導：

教育部於補助私立大學及專門學校經費項下，本年度準給本校補助金五千元 (文華圖專, 2009a, 頁 157)。

全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二十四年度補助費，於本年七月間由教育部呈核公佈。計本校核定之數為五八二二元……而上年度補助費所指定之用途 (設置檔案研究之講座及書籍用品) 所得成績亦復認為滿意也 (文華圖專, 2009b, 頁 258)。

1934、1935 兩年度，文華圖專共得 10,822 元補助金，為檔案學教育的開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文華檔案特種教席的設置、檔案管理課程的開設，不但得到了政府的認可，也得到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關注與幫助。該會「係 1924 年成立，負責保管與支配美國第二次退還之庚子賠款餘額，用以促進中華教育與文化事業」(財團法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2018)。《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8 卷 2 期的「校聞」中〈基金會派人來查並繼續補助本校〉報導：

四月某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派秘書林伯遵先生及特約視察員萬冊先先生來本校視察。由沈校長逐事加以說明。林氏對於本校檔案管之法特感興趣，於其他各事亦表示滿

意。故本年該會董事會聚會，又復通過本校之補助費一萬五千元（文華圖專，2009d，頁 568-569）。

1939 年秋季，文華圖專為適應戰時特定需求，將開辦的第五期講習班課程講授改以檔案管理為主，以圖書館學為輔。1940 年春、秋，文華圖專分別招收了兩期檔案管理訓練班。同年九月，呈請教育部設立檔案管理專科。文華圖專認為：

根據本校五、六年來試驗之結果，檔案管理內容並不簡單，如行政組織、公務管理，以及文書製作與處理等，必須循序研究，始能組成一完備之知識。故檔案管理再不能以圖書館學之附庸視之，而實有成科之必要。

為求不斷供應此項技術人才，並非短期開班或附帶於其他學科中研究所能為功，必須設科專門訓練以宏造就（彭敏惠，2015a，頁 141-142）。

在客觀環境上，當時的戰亂導致檔案管理人才的短缺，也促成政府亟需解決這一問題。沈祖榮（西元 1883-1977）在〈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近況〉中介紹：

教育部一再明令，陳部長（陳立夫）並面諭本校校長，以圖書與檔案人員之訓練極須擴充，以供應抗戰中所需專材之用。除三十年春季秋季各添招圖書科一班，三十一年春季招收檔案科一班外，並奉令於三十年度舉辦檔案人員短期訓練班，以應急需。（沈祖榮，1942，頁 8）

由此可見，文華圖專檔案管理科的成立有兩股促進力量。其一是來自政府為解決戰時檔案管理人才的需求；其二來自檔案管理與圖書館學之學科差異，檔案學教育必須自成一科，纔可著力於講授檔案管理之理論與實務。

1940 年 10 月，檔案管理專科班正式成立。1940 年春、秋招收的兩期檔案管理訓練班學員改入檔案管理專科。1947 年秋，檔案管理專科招收了最後一屆學生，前後共招收六屆（彭敏惠，2015a）。文華圖專檔案管理專科的創辦，象徵著中國近代培養檔案專業人才的開始。

1941 年，文華圖專由教育部指定籌辦檔案管理短期職業訓練班，簡稱「短訓班」。同年 12 月開辦計劃得到教育部批准。自 1942 年春季招生至 1945 年秋，前後共舉辦 7 期，見表 1。

表 1

文華圖專檔案學教育一覽表

類別	具體名稱	入學時間	招收對象及要求	年限
講習班	第五期講習班	1939 年秋	高中畢業或具有高中畢業畢業之同等學力二十二歲以下學生	1 年
訓練班	第一期檔案管理訓練班	1940 年春	高中畢業生	-
	第二期檔案管理訓練班	1940 年秋	有過同類工作經驗者	
專科班 (6 屆)	檔案管理科	1940 年春	凡高級中學畢業或在大學修業者均可報考，但師範學校及職業學校肄業生，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2 年
		1940 年秋		
		1942 年春		
		1944 年秋	1. 凡高級中學畢業或在大學修業者均可報考；2. 服務年限達 3 年的師範學校及職業學校肄業生，可以同等學力報考	
		1945 年秋		
1947 年秋				
短期職業 訓練班 (7 期)	檔案管理 短期職業訓練班	1942 年春	1. 各機關擇優保送現職檔案管理人員；2、面向社會招考；3、學歷要求在初中畢業或高中肄業水平	3 個月
		1942 年秋		
		1943 年春		
		1943 年秋		
		1944 年春	高中畢業生	4 個月
		1944 年秋		
1945 年春				

資料來源：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的創建與發展（頁 136-144），彭敏惠，2015a，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

（二）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圖書博物館學系

社教院成立於 1941 年 8 月。社教院創院之初設立圖書博物館學系，該系圖書館學是中國國立大學最早設立的大學部專業，在中國近代圖書館學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辦學宗旨在「訓練專才，加強社會服務事業的陣容，使學生從學校裡獲得基本的整理與鑒定圖籍和器物的方法——圖書館方法——應用到將來所從事的教導民眾的事業中」（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編輯部，1943）。

社教院圖書博物館學系的課程設置主要分為一般性課程、技術性課程、學術性課程、輔導性課程四大類。一般性課程包括：圖書館學通論、博物館學通論、圖書館行政與設計、圖書館史、博物館史、特種圖書館學、特種博物館學、教育博物館學；技術性課程包括：圖書編目學、分類學、資料整理法、圖書館經營法、圖書選擇與訂購、圖書館推廣、古跡古物鑒別法、博物物品整理法、博物館經營法、標本採集與製作、博物館使用法、檔案經

營法、打字；學術性課程包括：目錄學、各類名著介紹、版本學、參考書及參考工作、考古學、古物概論、金石學、美術史、史料研究、自然科學、工藝科學、閱覽調查與研究；輔導性課程包括：檢字索引法、問題研究方法、英法德日外國語，尚有選修科目十餘種（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編輯部，1943）。

由此可見，社教院的檔案學教育並未形成一個專門的組或科，亦未以講習會、訓練班等形式展開，而是在圖書館學、博物館學的教育中開設檔案學相關課程「檔案經營法」、「資料整理法」、「史料研究」，以此訓練學生在掌握圖書館學或博物館學知識的同時，能熟識檔案管理的相關理論與實踐技能。

（三）江蘇省立江蘇學院行政管理系

江蘇學院的行政管理專業始於 1941 年 8 月。1941 年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一年制）變更為三年制的蘇皖聯立技藝專科學校，該校設行政管理科。1943 年 8 月，蘇皖聯立技藝專科學校升格為四年制江蘇學院，行政管理科改為行政管理系。原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行政管理科的學生准許升入行政管理系就讀，但需延長修業半年（最後半年為院外實習期間；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1986）。

行政管理專業的設置並非創辦者心血來潮之作。1940 年 3 月，蔣中正提出「行政三聯制」，即：「計劃」、「執行」、「考核」三聯制（吳定、張潤書、陳德禹，1989）。國防最高委員會旋即分別成立中央設計局、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積極推動行政三聯制。有鑒於此，1941 年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改制為蘇皖聯立技藝專業學校之時，學院創始人顧祝同（西元 1893-1987）和代主任委員孔充（西元 1897?-?）商議設立行政管理科，「以迎接時代潮流，適應國家需要，培育實用之行政人才，借重科學管理之成效，進而作行政管理學術之深入而有系統之研究」（劉勝旗，1980，頁 42）。

行政管理專業依據學生的志願分為：人事管理組、文書管理組、財務管理組、財物管理組、事務管理組、行政機構組，共計 6 組。這六組的劃分並非將學生在課程安排上予以區分，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仍然需要必修 6 組的課程，「只是各人依志願專精一組，搜集研究數據，作深入有系統研究，撰為專論。期能改進當前行政措施，以提高各機關之行政效率」（劉勝旗，1980，頁 42），進而適應抗戰的需要。江蘇學院行政管理系的檔案學教育主要透過文書管理組實施。

（四）私立崇實檔案學校

1946 年 3 月，殷鐘麒（西元 1907-1970）在重慶創辦私立崇實檔案函授學校，因「中國文書檔案有其特殊環境，不同習慣，及歷史之演變，今以實際經驗創造之法則，著為講義，用期坐言起行，學得致用，故命名『崇實』之本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87，頁

666)。1947 年，學校更名為「私立崇實檔案學校」(四川地方誌編纂委員會，2000)。

該校設有函授部、面授部、出版部，函授部編發講義，用通訊的方式教學(殷鐘麒，1959)。面授部需每班 10 人以上方開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87)，但面授部至學校關閉未正式開班(殷鐘麒，1959)。函授部分為文書處理科、檔案管理科，每一科又分為初級班與高級班。高級班須高中以上學校及本校初級班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方可報考；初級班須初中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者。初級班主要培養文書檔案佐理之人員，高級班主要培養文書檔案幹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87)。每期三個月。

二、檔案學教育師資

在文華圖專、社教院圖書博物館學系、江蘇學院、崇實檔案學校負責檔案學教育的老師為數不少，如文華圖專的費錫恩、毛坤、徐家麟(也在社教院兼課)、汪應文、梁建洲、黃彝仲、何德全，社教院圖書博物館學系的周連寬，江蘇學院的陳國琛、孔充、高柳橋、陳朝璧、張國鍵，崇實檔案學校的殷鐘麒等等。下面將擇要作簡單介紹：

費錫恩(Grace D. Phillips, 西元 1880-?)，伊利諾伊大學圖書館學學士，有在多所圖書館實務工作的經驗。1934 年至 1936 年期間，費錫恩在文華圖專服務(彭敏惠，2015b)。而後，費錫恩因病回國(彭敏惠，2017)。費錫恩講授的檔案管理課程主要是「西文檔案」。課程內容為美國機關、團體、企業實行的文書檔案管理辦法(梁建洲，2007)。

毛坤(西元 1899-1960)，字良坤，號體六，四川宜賓人。圖書館學家、檔案學家。1920 年四川省立師範學校畢業，先後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和華中大學文華圖書科學習，1928 年自文華圖專畢業後留校任教。1928 年至 1947 年，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教務長等職。1947 年，文華圖專從重慶遷返武昌，毛坤因病未能隨之前往，隨後接受四川大學的邀請，擔任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圖書館館長(程煥文，2013)。其教學和研究領域涉及編目法、分類法、檔案經營、檔案行政等多個領域。1934 年，開設中文檔案管理一課。1940 年，文華圖專設立檔案管理專科，其兼首任科主任，開創中國現代檔案管理之先河，被譽為中國「圖書館學巨擘，檔案學權威」(毛坤，2013)。曾開設「檔案經營法」、「檔案行政學」、「檔案編目法」等課程，並編寫多部教材(毛相騫，2013)。

徐家麟(西元 1904-1975)，曾用名徐行，湖北沙市人，文華圖專圖書館學本科班畢業後進入中華教育改進社，任圖書館主任一年；後進入清華大學，任中文編目館員；隨後調入燕京大學圖書館，任中文編目組主任。1929 年 9 月，返回母校文華圖專任職，歷任講師、副教授兼教務主任。1935 年 9 月至 1939 年 9 月在美國留學、工作，獲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碩士。1941 年，社教院在四川璧山縣成立後，任社教院教授。1946 年，文華圖專自重慶返回武昌，徐家麟未隨校返回武昌，而是跟社教院遷至蘇州，繼續擔任教授。1950

年 3 月，其轉任華中大學圖書館主任兼歷史系教授。1955 年，徐家麟調入武漢大學，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專科主任、教授；1956 年 4 月至 1966 年，擔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柯愈春，2009）。徐家麟在文華圖專曾教授「英文檔案管理法」（1938 年 7 月至 1939 年 7 月）。在文華圖專舉辦的檔案管理短期職業訓練班中，主講「資料管理」（每週 2 課時，實習 2 周）。此外，他還編寫了「西洋檔案通論」、「資料管理」等講義（邵金耀，2006）。

汪應文（西元 1908-1991），湖北漢陽人。1933 年 9 月至 1935 年 6 月在文華圖專圖書館學本科班就讀。1935 年 6 月，其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留校並擔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48 年，汪應文任《華中日報》總主筆兼總主編，但仍在文華圖專兼課到 1949 年。1949 年，汪應文離開武漢，任重慶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史地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西南人民圖書館圖書部主任。1951 年 8 月，西南師範學院圖博科成立，汪應文受聘為教授。1954 年，圖博科停辦，汪應文改任南充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1956 年調任南充師範學院圖書館館長（尹吉星，2012）。根據「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 28、30 年度畢業生案」檔案顯示，汪應文在文華圖專期間，教授的檔案學課程主要有「文書管理」、「檔案分類法」、「史料整理法」等課程（教育部，1941）。

梁建洲（西元 1919-2013），四川榮縣人，1940 年 9 月至 1942 年 7 月就讀文華圖專，係檔案管理專科第二屆畢業生。畢業後，留校任教至 1947 年 1 月，先後擔任助教、講師。1947 年 5 月至 1949 年 1 月，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國防部副官局檔案處檔案政策科科長等職（梁建洲，2007）。1945 年起，接替毛坤講授「檔案經營法」（梁建洲，2013）。

周連寬（西元 1905-1988），原名周梓賢，曾用名周釗，筆名苦竹齋主、蠹公、寬予，廣東潮州人。1930 年畢業於華中大學文華圖書科，1932 年 8 月任國民政府內政部圖書館主任。在其任職期間因參與設計「文書檔案連鎖法」而成為國民政府「行政效率運動」中的改革中堅。周連寬在總結其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我國檔案學發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兩本學術專著：《縣政府檔案處理法》和《縣政府文書處理法》（程煥文，2008），奠定了他在中國檔案學史上的重要地位。1945 年抗戰勝利後，周連寬出任上海市立圖書館館長一職，於「丙戌之秋（西元 1946），承社教院之邀，赴蘇講學」（苦竹齋主，1948）。至此，周連寬成為社教院圖書博物館學系教授之一，教授檔案學課程，直到 1948 年 12 月。

孔充，字大充，江蘇興化人（顧頡剛，1987）。生於詩書傳承之家，幼年入私塾、小學，後入著名的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今江蘇省揚州中學），畢業後入讀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今河海大學），1924 年獲金陵大學文學學士，國學根底深厚。1929 年至 1935 年，先後在泰縣、淮陰、東海、南彙等縣任縣長，撰有《縣政府建設》一書。1936 年赴美留學，獲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政治學碩士，後赴歐洲考察地方政府，1939 年回國（王崇生、盧偉，2007）。1940 年，孔充任蘇皖聯立政治學院代副院長，實際主持校務。

1942 年，任蘇皖聯立技藝專科學校校務委員會代副主任委員並擔任行政管理科主任。1943 年奔赴重慶游說教育部將蘇皖聯立技藝專科學校升格為四年制大學，同年 8 月教育部批准江蘇學院成立。孔充主要講授公文作法。

陳國琛（西元 1898？-？），別號寄安，安徽宿松縣人，自稱皖江寄安陳國琛。1921 年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經濟系研究科。畢業後，陳國琛投筆從戎，在多處軍隊擔任秘書工作。1934 年 10 月，陳國琛經馮玉祥介紹至宋哲元所在的察哈爾省政府任參議，至此他開始由部隊秘書工作轉向從事地方機關的文書檔案工作（韓李敏，1989a）。1935 年，陳國琛到福建工作，初在福建省政府任參議；次年 8 月，福建省政府任命其為秘書處第一科科長，主管一府的文書檔案工作。1936 年至 1938 年三年期間，陳國琛主持福建省文書改革，改革內容涉及文書收發、文書處理和檔案管理三個方面（韓李敏，1989a）。1938 年 10 月 15 日至 1939 年 1 月底，適逢福建省政府疏散永安，在此期間寫出《文書之簡化與管理》，該書 1946 年在臺灣出版（陳國琛，1946），後又經中國人民大學重新翻印，乃檔案學經典著作。1943 年 8 月 29 日至 10 月 24 日，陳國琛前往江西省訓練團檔案管理人員訓練班講授檔案分類等課程，而後江西省開始推廣《全國縣市政府檔案分類法》，即陳國琛法（鄭海濱，2001）。1945 年赴臺前，陳國琛曾在江蘇學院行政管理系任教，教授文書管理課程。赴臺後，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公報室（後改名為編輯室）主任並兼任秘書處文書科科長，主持戰後臺灣省文書改革事宜（1945 年 10 月至 1946 年 10 月）。「二二八事件」後，陳國琛隨陳儀前往浙江，被任命為浙江省政府參議兼秘書處第一科（文書科）科長，要求其主持浙江省文書改革（韓李敏，1989b）。

三、檔案學專著

民國檔案學教育雖然從 1934 年才開始，但是現代意義上的檔案學專著卻從清朝末年即有。據《檔案學論文著作目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資料室，1961）、《檔案學論著目錄（1911-1983）》（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資料室，1986）和《中國檔案學文書學要籍評述（1910-1986）》（劉文傑，1987）的統計數據顯示：1910 年到 1949 年之間，至少出版了 153 種檔案學專著，涉及到公程式、文書處理、檔案管理等領域。

在專著之外，故宮博物院先後出版了《文獻特刊》（1935 年）、《文獻論叢》（1936 年和 1948 年）、《文獻專刊》（1945 年），書中著重推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藏之檔案以及對這些檔案的整理與編纂。除此之外，《行政效率》、《行政效率研究》、《服務》、《故宮周刊》、《圖書館學季刊》、《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禹貢半月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新四川》、《地方建設》、《故宮博物院年刊》等期刊上亦多有刊登檔案學相關論文。

四、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概述

從 1934 到 1949 年間，民國檔案學教育逐步形成了以文華圖專、社教院、江蘇學院、崇實檔案學校為主的辦學機構。其中，文華圖專各類檔案學教育共招生 388 名，包括講習班 12 人、專科班 94 人、短期職業訓練班 28 人；畢業人數 318 名，包括講習班 12 人、專科班 46 人、短期職業訓練班 260 人（彭敏惠，2015a）。社教院接受過檔案管理課程教育的學生約 100 名（張衍、衛瀟、周毅，2012）。江蘇學院培養了 84 名學生（張衍，2016）。崇實檔案學校共招生 294 人（殷鐘麒，1959），畢業人數未知。四校共計招收了近 900 名學生，畢業人數不少於 500 人。這些辦學機構培養的學生一方面緩解了戰時對於文書檔案管理人才、史料整理以及行政管理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培養了部分檔案學教師，如梁建洲、黃彝仲、何德全等（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校友名錄（1920 級-2010 級）編委會，2010）。

在人才培育和師資力量養成之外，民國檔案學教育的另一大貢獻則是課程建設。以文華圖專為例：1934 年創辦檔案管理特種教席時，僅開設「檔案管理法」課程；1936 年，該課程增加了實習內容，並於 1937 年初步系統化（彭敏惠，2015a）。待 1939 年「第五屆講習班」開班時，已經形成了初步的檔案學教育課程體系。檔案管理的相關課程已經從單獨的乙門課程發展到多門，如：檔案編目法、檔案分類法、檔案管理（甲）、檔案管理（乙）、文書管理等。此外，還開設輔助課程，如圖書館學概論、實習、外文等（周洪宇，2013）。檔案管理專科的成立，意味著文華圖專檔案管理課程體系正式構建完成。從第二屆檔案管理專科畢業生的學業成績通知單可知，檔案管理類課程已經發展到九門，即：西洋檔案學、中國檔案論、檔案經營法、檔案行政學、檔案編目學、檔案分類學、公文研究、公務管理、史料整理法。配套的基礎課程有：檢字法、分類原理、編目原理、研究方法、立序列法、打字；跨學科課程有：圖書館學概論、社會科學概論、博物館學、史地概論、圖書訂購法、中國目錄學、行政管理學、自然科學概論、政府組織概要等。通識課程主要有：國文、三民主義、英文、軍訓、音樂、體育等（教育部，1941）。崇實檔案學校的課程也比較成體系，其函授課程依據科別和班別的不同而有所調整。初級班的課程一般為四門，高級班的課程一般為七門。文書處理科初級班的課程有：文書處理概論、檔案管理概論、公文程式、檢字法；檔案管理科初級班的課程為：檔案管理概論、文書處理概論、公文程式、檢字法。文書處理科高級班的課程為：文書處理緒論、文書處理行政、文書處理原則、文書處理程序及方法（內分總收發文、司科收發文、呈閱、交辦、擬稿、校判、繕校、監印及機密文件各項處理之理論與實際）、公文檢查、公文簡化問題、檔案管理概論；檔案管理科高級班的課程為：檔案管理緒論、檔案管理行政、文書檔案連鎖辦法之實施、檔案管理程序及方法（內分點收、登記、分類、編目、編卷、裝訂、排列、典藏、出納各項處理之理論與實際）、整理舊卷、公文檢查、文書處理概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87）。

在多年的辦學和實踐過程中，逐漸成長起一批檔案學教師。如上述論及的毛坤、徐家麟、汪應文、梁建洲、黃彝仲、何德全、孔充、陳國琛、周連寬、殷鐘麒、傅振倫等。另有一批雖未從事檔案學教育，但在文書檔案管理、史料整理中積累了豐富實務經驗并有論著面世的學者，如許同梓、何魯成、龍兆佛、秦翰才、徐望之、程長源、朱伯郊、陸晉蘧、周定枚、張銳、殷菊亭等。上述學人或是編訂教材講義，致力於檔案學人才的培養，推動檔案學教育的發展；或是出版學術專著，組織發行學術期刊豐富檔案學理論，指導文書檔案館與史料整理的實務工作，共同構成了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

參、蘇聯檔案學教育的輸入

一、蘇聯倡議設立檔案學院

大陸地區新政權建立之初，百廢待興。蘇聯在多個方面予以了援助，如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科技等。1949 年 10 月，蘇聯政府派檔案專家米留申赴大陸地區（吳寶康、鄒家煒、董儉、周雪恆，1983）。米留申不是單人前來，而是隨著一個龐大的顧問團前來的。因為是蘇聯方面主動派來的，大陸地區並沒有留意到米留申檔案專家的特別身份。《曾三傳》中寫道：

蘇聯專家小組組長柯瓦略夫對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局長師哲講，他們新近來了一個整理與管理檔案工作的專家，不知中央機關是否需要他幫忙或講講問題。11 月 18 日，師哲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彙報了這件事，毛澤東在信上批道：「周：此兩事請酌辦。」周恩來閱後批給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要楊尚昆「召集黨、軍兩方管理文書檔案的人，由曾三負責，請這個同志來教授，向之學習，請師哲同志轉達。」（賴世鶴、田真，2016，頁 165）

最高首長的指示和拍版，讓曾三（1906-1990）等人迅速的行動起來。1949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 日，米留申先後到中共中央秘書處、中央組織部、軍委總政治部等單位參觀檔案工作。12 月 27 日，米留申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召開的檔案工作座談會上，作了「關於檔案工作的一般問題及中國檔案工作目前的缺點」的報告（王景高等，1993）。1950 年，蘇聯專家米留申先後於 6 月 5 日、7 月 20 日、8 月 10 日三次致信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建議成立國家檔案館，成立五個中央國家檔案館，制定全國統一的文書檔案工作制度、全國統一的標準的文件材料保管期限一覽表，並附有他起草的《政務院關於組織檔案局的決定》（草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檔案局暫行條例》（草案）、《共和國國立檔案館、機關檔案室的組織機構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機關、團體、企業文書檔案工作暫行辦法》、《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會及其它團體、企業標準文件資料保管期限明細表》等文件。

同年 8 月 28 日，米留申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會）與中共中央機關秘書檔案工作座談會上作了「關於改善中國國家機關、團體文書檔案工作的任務」的報告(王景高等, 1993)。米留申的建議，概括起來有：建立國家檔案館、國立檔案館、機關檔案室，構建覆蓋全國的檔案館體系；成立檔案局；構建統一的文書檔案管理辦法；構建統一的標準的文件材料保管期限一覽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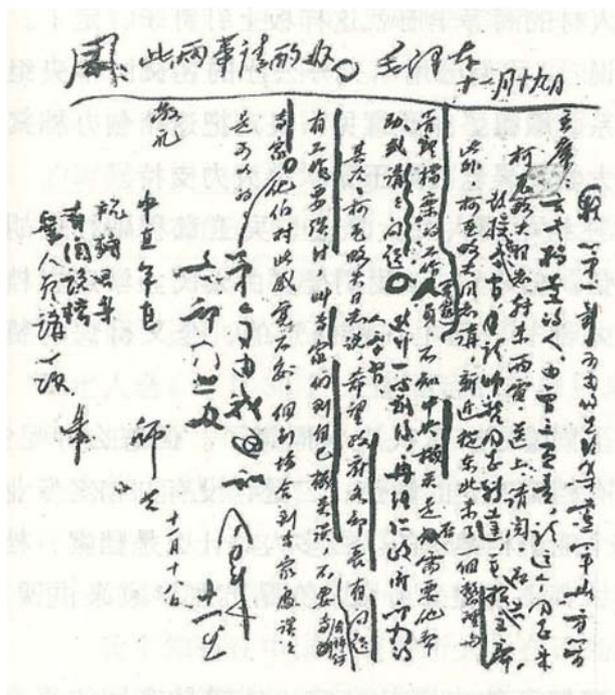


圖 1 師哲給毛澤東的信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批覆
資料來源：曾三傳（頁 165），賴世鶴、田真，2016，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

這一連串的、高密度的、熱情的動作，著實超出了大陸地區對米留申的預期。賴世鶴與田真（2016）在《曾三傳》中寫到：「當時只是同意米留申給黨、軍機關文書檔案工作人員講講課而已，不包括他後來在實際活動中所超越的範圍」。當時，學習蘇聯是從上而下的政策和指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多次表示要以蘇聯為師。早在 1949 年 6 月份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說：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蘇聯共產黨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即史達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毛澤東，1991，頁 1481）

在這種「以蘇聯為師」的政策導向下，曾三等人一方面認真的聽取了上述建議；另一方面又囿於當時的國情國策而無法實施，其中不乏對上述的建議認識不深入。這種未深入認識可以透過兩件事請加以驗證。一事情是，直到曾三等人想辦理檔案專業之時，因缺乏專業教師，他們想到再請米留申來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之時，方纔知曉米留申的真實身份。

裴桐說：蘇聯檔案專家米留申來過中國，是不是請他來？

曾三說：你和我想到一塊去了：他很合適。……

曾三對裴桐說：米留申來不了啦。他不是一般的蘇聯檔案專家，他是蘇聯中央檔案管理局副局長。（賴世鶴、田真，2016，頁 166-167）

另一件事情是，米留申幫忙起草的幾份文件在當時並未得到重視，直到 1956 年，大陸地區檔案學教育已經建立、國家檔案局業已成立之時，另外一位蘇聯檔案專家——格·伊·沃爾欽科夫來到大陸地區，重新幫忙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機關、團體、企業檔案室工作通則（草案）》（格·伊·沃爾欽科夫，1956a）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部及其他機關、團體、企業活動中所形成的標準文件材料保管期限表（草案）》（格·伊·沃爾欽科夫，1956b）。

由此可見，無論是米留申的身份還是其提出的建議的重要性，在當時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認知。但是，米留申有一項建議不但得到了充分的重視，而且驚動了中共高層。這個建議就是——創辦檔案學院。他建議道：

蘇聯在 1930 年就已經創辦檔案學院了，中國也應該有這麼一所學校。（賴世鶴、田真，2016，頁 166）

蘇聯的檔案學教育起步較早。聖彼得堡考古學院（St.-Petersburg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和莫斯科考古學院（Moscow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分別於 1877 年、1907 年開展檔案學教育，此二校於 1922 年被分別併入國立彼得格勒大學（Petrograd State University）和國立莫斯科大學（Moscow State University）社會科學學院（Guseva & Makarova，2015）。1930 年，蘇聯新創立了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Mosc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曾三等人認為：一個檔案工作者要接受大學專業教育，有利於提高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新中國檔案事業的發展。於是，曾三立即將這個建議彙報給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不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均被驚動，馬上拍板同意，並且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與中央組織部、宣傳部溝通之後，決定將創辦檔案專業的任務委託給中國人民大學，並得到了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延安五老之一）的支持（賴世鶴、田真，2016）。但是由於當時各方面條件尚不充分，未能一步到位建立蘇聯方面倡議的「檔案學院」，而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增設「檔案班」。1952 年 4 月 24 日，中共中央辦公

廳和組織部面向全大陸地區發出《關於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工作訓練班招生的通知》(人大信管院, 2012); 同年 11 月 15 日, 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檔案班正式開學(王景高等, 1993)。

二、移植蘇聯檔案學教育模式

1952 年, 中共中央辦公廳欲創建檔案學教育之時, 當時負責創辦檔案學教育的曾三認為面臨諸多困難。賴世鶴與田真(2016, 頁 166) 在《曾三傳》中寫到:

辦檔案系的問題, 領導上同意了, 人民大學同意了。但怎麼辦呢? 曾三感到很困惑。一是, 沒有檔案專業的教員; 二是, 沒有辦檔案專業的經驗。從全國也調不出一個能講檔案課的。很多人對什麼是檔案, 檔案怎樣整理立卷, 怎樣分類, 都不清楚。所以只有請蘇聯專家來講課, 請他們幫助我們培養師資了。

曾三等人認為大陸地區「一無教員、二無教材、三無經驗」(謝麗榮、賴世鶴, 2016)。蘇聯檔案專家米留申因其工作與身份問題又無法前來任教, 因而大陸方面將委派檔案專業教師的任務交由蘇聯方面決定。1952 年 8 月, 周恩來率團訪問蘇聯, 徵詢蘇聯方面對大陸地區「一五計劃」的意見, 並商談在此期間對大陸地區援助事項。此外, 中共中央還交給周恩來一個特別任務——為馬列主義學院(即現在的中共中央黨校)和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專業請蘇聯專家(賴世鶴、田真, 2016)。

蘇聯方面接到了大陸地區關於派遣檔案學教師的要求後, 派出了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姆·斯·謝列茲聶夫。據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院長阿·斯·羅斯諾娃介紹, 謝列茲聶夫還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部檔案管理局科學委員會的委員(阿·斯·羅斯諾娃, 1958)。

1950 至 1953 年關於蘇聯專家工作的內部報告顯示, 中國人民大學對蘇聯專家一直採取極為遷就的政策(Stiffler, 2010)。這種對蘇聯專家「一邊倒」的策略, 在客觀上保證了謝列茲聶夫可以較為順利地將蘇聯檔案學教育移植到大陸地區。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對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專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幫助。1955 年, 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院長阿·斯·羅斯諾娃給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校長的信中說到:

我們學院認為, 盡一切力量去滿足貴校歷史檔案系的要求是我們的職責, 並表示我們有與中國人民大學建立友好合作和經常聯繫的決心。

我們早已把已有的(專業課目的大綱和教材)寄給您們所熟悉的我院講師姆·斯·謝列茲聶夫了。……目前我們正準備出版某些新的教材, 其中有「文獻公佈學讀本」、「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講授綱要、「蘇聯文書處理工作的歷史與組織」教材以及某些教學大綱。當這些教材出版時, 定將寄給您們(阿·斯·羅斯諾娃, 1955, 頁 34)。

謝列茲聶夫講授的課程，全部是蘇聯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的課程，共有六門課。這六門課是蘇聯檔案工作理論與實踐、蘇聯檔案史、蘇聯文書處理工作、蘇聯文獻公佈學、蘇聯檔案保護技術學、蘇聯科技檔案。在此基礎之上，中國人民大學翻譯了一批教材和講義，如《蘇聯檔案史（簡明教材）》等（中國人民大學檔案教研室，1953）。

三、對蘇聯檔案學教育的反思與「本土化」

對於 1950 至 1953 年之間向蘇聯學習的重新評價在史達林（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878.12.18-1953.3.5）去世後不久就開始了，並導致了用更具批判性和選擇性的態度看待「將蘇聯先進經驗和中國實踐相結合」（Stiffler, 2010）。出現這種狀況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蘇聯專家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因為各種因素沒有考慮到大陸地區的本土實際情形或經驗。因此，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出現了對部分蘇聯專家批判的態度。在對蘇聯專家批判的過程中，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專修科對謝列茲聶夫進行了完全正面的評定：

對有些專家的評定是完全正面的。例如對檔案專家謝列茲聶夫的評定，贊揚他靠一人之力在人大設立了這門課程，系裏說他的消極面微不足道（Stiffler, 2010, p. 310）。

對謝列茲聶夫的正面評價一方面源於其忘我的工作和負責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歸功於其對中國本土經驗的重視。雖然他「沒有來過中國，對中國的檔案工作情況不瞭解，他對中國一般情況和中國歷史也瞭解不深，對中國各機關情況更不熟悉」（程桂芬，1999，頁 8），但是他並沒有一味地傳授蘇聯經驗，而是督促中國人民大學將蘇聯經驗與本土結合。1954 年 12 月，其建議聘請一位中國人講授中國檔案史，但是教研室報告說這會有困難（Stiffler, 2010）。

1955 年 6 月，謝列茲聶夫回國（人大信管院，2012）。在將近三年時間學習和借鑑蘇聯經驗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各專業教研室積極組織開展教學和科研活動，由歷史檔案系開設的專業課已發展到七門，即檔案工作理論與實踐、文書處理學、中國國家機關史、中國檔案史、檔案保管技術學、檔案文獻公佈學、蘇聯檔案史等。其中以中國檔案史、中國國家機關史、文書處理學等課程為代表，初步建立了本土檔案學的課程體系。到 1959 年，這些課程體系進一步擴大、內涵逐步增深、外延在不斷擴展，本土特色也愈益明顯（人大信管院，2012）。

1957 之後，中蘇交惡，雙方關係反覆，一直到 1989 年之前才實現關係正常化。但大陸地區檔案學教育的原型在此之前業已底定，並在 1955 年之後逐步由「以蘇聯為師」走向「本土特色」。

肆、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的「隱身」與啟用

一、不符預期的民國檔案學教育

曾三等人創辦檔案學教育之初，並未優先考量到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因而才會認為面臨「一無教員、二無教材、三無經驗」的困境。這種認知與實際情況有出入：

從辦學經驗上看，1949 年大陸新政權建立之前的主要檔案學辦學機構——江蘇學院行政管理系、崇實檔案學校分別於 1946 年、1948 年 12 月停辦，文華圖專與社教院則繼續營運。文華圖專於 1951 年 8 月 16 日被中南軍政委員會派員接管，學校名稱去掉「私立武昌」四字，改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學校性質由有教會背景的私立學校變成一所公辦學校（周洪宇，2013）。1953 年 8 月併入武漢大學，並存續至今，是為今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之前身（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校友名錄（1920 級-2010 級）編委會，2010）。1950 年 8 月 10 日，文華圖專呈文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請準繼續辦理檔案資料管理訓練班；8 月 24 日，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批准文華圖專舉辦短期檔案資料培訓班。在中南軍政委員會人事局和中南教育部的指示下，文華圖專迅速於當年 10 月開辦了為期四個月的檔案資料管理訓練班（周洪宇，2013）。社教院與文華圖專一樣，經歷了一系列的合併與改名：於 1950 年 2 月併入公立文化教育學院；同年 8 月，公立文化教育學院改名蘇南文化教育學院。1952 年院系調整時，與私立東吳大學文理學院、江南大學數理學系合併為蘇南師範學院（後改名為江蘇師範學院），1983 年江蘇師範學院再度更名為蘇州大學。據顧燁青（2010）考據發現：社教院在 1949 年春已處於非正常教學秩序狀態，1950 年初社教院圖博系業已停辦。由此可見，在中國人民大學創辦檔案學教育之前，繼承民國檔案學教育的文華圖專有意願、有能力開展檔案學教育，且有實際的辦學經驗。

從教員方面來看，曾在文華圖專、社教院、江蘇學院、崇實檔案學校等學校任教、並且仍然留在大陸地區的檔案學教師有：毛坤、徐家麟、汪應文、梁建洲、孔充、陳國琛、周連寬、殷鐘麒、黃彝仲、傅振倫。此外，《檔案管理法》與《公文檔案管理法》兩書著者龍兆佛（時年 53 歲）、《檔案科學管理法》一書作者秦翰才（時年 57 歲）也留在大陸地區。

在檔案教材、講義方面，毛坤編有《檔案經營法》、《檔案行政學》、《檔案編目法》（梁建洲、廖洛綱、梁鱣如，2000）；傅振倫於 1948 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專修科講授「檔案與資料」課程（傅振倫，1999），並編有《檔案與資料》講義。

由此可見，1952 年大陸地區在中國人民大學創辦檔案專修班之時，論經驗，文華圖專、蘇南文化教育學院均有開辦檔案專業或檔案課程的經驗；論教員，至少有 10 位 1949 年之前檔案學教育的教員仍留在大陸地區；論教材，有《檔案經營法》、《檔案行政學》、《檔案編目法》、《檔案與資料》等。

2012年，北京電視台「檔案」節目組經過採訪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創辦歷程中相關重要人物，在基於大陸地區「中央檔案館」等館藏檔案的基礎上，播報了一期「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誕生記」，介紹到：

過去，中國共產黨只有辦革命大學、軍政大學這一類學校的經驗，對於辦一個正規的大學，特別是學習檔案專業的大學，完全沒有經驗。

綜上所述，當時大陸地區並非「一無教員、二無教材、三無經驗」，而是沒有符合創辦人預期的「教員、教材、經驗」。也因為如此，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專修班在創建之初，並未啟用民國檔案學教育遺留的教員、教材、經驗。

二、檔案學教育的政治性預期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預期中的檔案學教育是什麼樣的？針對這個問題，蘇聯結合自身檔案學辦學經驗，摸索出了一套經驗。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院長阿·斯·羅斯諾娃曾指出：

在革命勝利的初期，很多舊俄時代出生於統治階級的檔案工作者對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抱著敵對態度。他們用怠工和破壞的方法擾亂蘇維埃的檔案建設事業，使蘇維埃國家利用檔案發生困難。因此，培養忠於蘇維埃政權的檔案工作者，便成了檔案機關的主要任務（阿·斯·羅斯諾娃，1958，頁189-190）。

1928年7月，聯共（布）中央全會專門討論了培養蘇維埃知識分子幹部的問題，決議指出：培養新專家是全黨的極重要的任務。因此，根據蘇聯中央檔案管理局的申請，通過了關於成立檔案學院的決議。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不同於之前的檔案教育機構，這是一所致力於培養蘇聯檔案機關的領導人員和科學工作者為目的的學校。

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從三個面向採取措施。學生層面上，加強對申請入學學員考察，判斷其是否真正願意在蘇聯檔案機關工作，希冀通過這些考察和篩選，達到改善未來檔案機關工作人員的社會成分，加強檔案機關內黨員和共青團員的成分，並保證為檔案機關培養少數民族幹部。1934-1935學年，因為發現學生有輕視幾門檔案學課程和缺乏紀律的現象，學院辦公室和各組織機構即刻在學生中展開工作，以扭轉這種現象。教師層面上，1934-1935學年，有六名教員因在教課中犯了政治性錯誤和歪曲行為而被解除教職；1945-1946學年，學院的馬列主義教研室因講解馬克思主義照本宣科，且學銜和學位不達標，整個教研室的全體人員被撤換。課程內容上，1948-1949年學年，史料學課程被院內黨組織和社會組織批評帶有資產階級歷史史料學家拉·波·丹尼列夫斯基的形式主義偏向，整個教研室進行業務檢討，「教研室的全體教授和教師短期內就克服了史料學課程中的形式主義和

資產階級客觀主義，並把這門課程建立在唯一科學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之上」（阿·斯·羅斯諾娃，1958，頁208）。

對檔案工作者，無論是現有的工作者、在學學生、教師以及課程內容等諸方面政治性的考量與要求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認為只有採用這樣的措施，才能確保檔案工作隊伍的政治純潔性，才「可以培養用唯一正確的馬列主義科學理論武裝、善於克服檔案學中資產階級觀點、能夠創立和發展蘇維埃檔案學、解決檔案建設實際任務的熟練的歷史檔案工作幹部」（阿·斯·羅斯諾娃，1958，頁190）。一旦發現與目標達成相悖的現象，都必須盡快予以檢討與糾正。

大陸和蘇聯有著相同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理念，在「一邊倒」的政策背景下，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這種預期的檔案學教育順利傳入大陸。注重檔案學教育各因素的政治性的考量為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的「視而不見」提供了解釋線索。從學生層面來看，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專業與莫斯科歷史檔案學員早年錄取學生的方式非常接近，即採取推薦制度。由各行政區劃單位選拔人員，推薦進入檔案學專業。從教師層面來看，據《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校友錄（1952-1987）》資料顯示：1953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培養了第一批檔案專業學生。從1953年至1966年間，先後有106位教職員工在此工作，其中約66.98%（71位）的教職員工為本專業培養的學生；而33.02%的非本專業培養的教職員工多是從別處聘來的翻譯、資料員或行政工作人員（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1987）。1953年7月之前即在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專業工作的15位教職員工：1位蘇聯專家、4位翻譯、2位秘書、1位資料員、1位歷史學教員，剩餘的6位多是從中共中央辦公廳等處借調而來的工作者。絕大多數教職員工為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專業培養的學生，或是從中共中央借調。從課程內容來看，早期通盤採用蘇聯的課程內容，後期才開始結合本土實踐經驗，開設在地課程。

三、本土化需求：有選擇地啟用部分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

對中國大陸本土經驗的重視推動了有選擇地啟用部分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謝列茲聶夫非常重視大陸的本土經驗。上節曾提及他並沒有一味地傳授蘇聯經驗，而是督促中國人民大學將蘇聯經驗與本土結合。其建議聘請一位中國人講授中國檔案史，但是教研室報告說這會有困難（Stiffler, 2010）。雖然有困難，但是中國人民大學還是採取了措施。1954年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研究生班學員畢業之後，學校安排程桂芬、胡明誠、陳章煥、何其燊等人在韋慶遠的帶領下籌備「中國檔案史」的課程。在這期間，他們請一批民國檔案學人來校講課，如于石生、單士元、單士魁、葉恭綽、劉國鈞、傅振倫、陳夢家等。其中，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劉國鈞講授圖書分類，及圖書與檔案的關係；請傅振倫講授國民黨

時期檔案的整理及文華圖專概況(程桂芬, 1999)。據傅振倫(1994, 頁 190)在〈六十年檔案工作記憶〉一文中回憶說：

1953 年在檔案幹部培訓班講授「中國檔案史」, 編成講義, 並把平日裡所寫有關檔案論著捐獻給人民大學。1956 年擇要油印成《歷史檔案參考資料》, 並打印出《檔案館學概論》。

傅振倫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檔案史」上課的時間與程桂芬的回憶有差異, 一位認為是在 1953 年, 一位認為是 1954 年 11 月之後(程桂芬, 1999)。但雙方對傅振倫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檔案史」課上任教的經歷並無爭議。1956 年, 根據傅振倫所寫檔案論著編成的《歷史檔案參考資料》油印本, 共計 12 篇文章和 2 篇附錄, 分別是:〈「檔案」名詞的原始〉、〈檔案與歷史〉、〈我們要向蘇聯文物工作者學習〉、〈遊英法檔案館小記〉、〈資本主義國家檔案的編目與排架問題〉、〈外國檔案館檔案參考與利用問題〉、〈普魯士培養檔案管理人員問題〉、〈檔案的保管工作〉、〈中國古代史官之建置及其職掌〉、〈中國歷代史官建置沿革〉、〈簡策說〉、〈論史料之種類〉、附錄〈編輯中國史籍書目提要之商榷〉、附錄〈一九一二年以來關於「國史館」的文件材料〉(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 1956)。

1949 年至 1957 年間, 傅振倫在北京歷史博物館工作, 其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學與科研是一種兼職行為(傅振倫, 1999)。1957 年, 大陸地區發生了「反右運動」, 傅振倫被北京歷史博物館錯劃為右派, 自此, 其「才和人民大學檔案系斷絕了聯繫」(傅振倫, 1994)。

另外一位得到啟用的民國檔案學教育學人是殷鐘麒。1958 年 12 月, 國家檔案局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內設立檔案學研究所(後改為檔案學研究室), 1961 年, 該機構因組織精簡被撤銷(吳寶康等, 1983)。這一時期, 殷鐘麒就在國家檔案局檔案學研究室工作。此外, 他還在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後改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擔任指導工作(程桂芬, 1999)。在國家檔案局檔案學研究室期間, 殷鐘麒(1959)出版了《國民黨時期檔案管理述要》。此外, 他還編有《國民黨統治時期檔案分類法概要介紹》講稿。

1958 年 2 月,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先後翻印了 1949 年之前出版的文書、檔案學舊著十三本, 有徐望之著《公牘通論》, 程長源著《縣政府檔案管理法》, 何魯成著《檔案管理與整理》, 龍兆佛著《檔案管理法》, 周連寬著《公文處理法》和《檔案管理法》, 陳國琛著《文書之簡化與管理》, 黃彝仲著《檔案管理之理論與實際》, 梁上燕著《縣政府公文處理與檔案管理》, 傅振倫、龍兆佛著《公文檔案管理法》, 秦翰才著《檔案科學管理法》, 許同莘著《公牘學史》, 殷鐘麒著《中國檔案管理新論》。舊著的翻印為檔案學研究提供了材料(吳寶康等, 1983)。

綜上所述, 這一時期大陸地區在本土化需求的推動下有選擇地啟用了部分民國檔案學

教育學人，也有選擇的翻印了部分 1949 年之前出版的文書、檔案學著作，以期為檔案學研究提供材料與借鏡。

伍、結語

自 1934 年到 1949 年的 15 年間，民國檔案學教育從一開始的文華圖專檔案管理特種教席發展到文華圖專、社教院、江蘇學院、崇實檔案學校等多所正規教育機構，其體量不算龐大，但已初具規模。在師資隊伍上，培養了毛坤、徐家麟、汪應文、梁建洲、黃彝仲、周連寬、孔充、陳國琛、殷鐘麒、傅振倫等一批檔案學者，這些學者在日常的教學、科研與服務的過程中，編著了《檔案經營法》、《檔案行政學》、《檔案編目法》、《檔案與資料》、《西洋檔案通論》、《資料管理》等教材講義。在檔案學專著上出版了至少 153 種檔案學專著，並培育了《文獻特刊》、《文獻論叢》、《文獻專刊》、《行政效率研究》、《服務》、《文化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等一批刊登檔案學研究成果的期刊文獻，為適時的檔案學研究、檔案管理實務提供了學術傳播與交流的平台。

1952 年，大陸新政權重構檔案學教育時，有意或無意忽略了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認為籌辦檔案學教育的困難主要在「一無教員、二無教材、三無經驗」。所謂的「三無」不是當下缺乏教員、教材和經驗，而是指沒有符合新政權、新意識形態下的教員、教材和經驗。所以，在創建之初，中國大陸並未啟用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大陸將目光投向蘇聯，希冀從蘇聯尋求幫助。當時，中蘇關係融洽，蘇聯派出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謝列茲聶夫前來支援中國大陸檔案學教育建設。在「以蘇聯為師」的政治氛圍之下，謝列茲聶夫順利將蘇聯檔案學教育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國大陸。

在移植蘇聯檔案學教育模式的過程中，中國大陸開始有選擇的啟用部分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這種有選擇的啟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民國檔案學著作中有選擇的挑選比較有代表意義的十三本著作重新出版，為檔案學的教學與研究提供材料和借鑒；另一方面，啟用殷鐘麒、傅振倫、劉國鈞等人，參與《中國檔案史》課程的籌備與教材的撰寫。這種參與是單向且暫時性的，這種參與的最主要目的是培養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留校的研究生，希冀透過培養新人，壯大檔案學教育的新生隊伍，也可以通過課程的本土化，使檔案學教育更加貼近本土、貼近實際。

謝列茲聶夫雖然將蘇聯檔案學教育模式成功移植到了中國大陸，但是這種移植不是教條和刻板的。他雖然不甚了解中國實際和檔案工作實際，但是他強烈建議並積極推動中國大陸應該在蘇聯模式和蘇聯經驗的基礎之上，結合中國大陸國情將蘇聯檔案學教育模式本土化。

綜上，站在歷史的路口，面對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和蘇聯經驗，中國大陸先是完

全接受蘇聯經驗，致力於移植蘇聯檔案學教育模式；而後，再根據國情著手將蘇聯模式本土化，使檔案學教育更加貼近本土與實際。在創辦初期，先是迴避了不符合預期的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遺存，而後，再有選擇的啟用部分民國檔案學教育資源。

(收稿日期：2018 年 8 月 25 日)

作者註

本文係 2018 年上海市社科規劃青年課題「臺灣地區檔案學發展史研究」(項目編號：2018ETQ002) 階段性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編 (2012)。《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簡史 (1952-2012)》。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
- 中國人民大學校史研究叢書編委會 (2007)。《中國人民大學紀事 (1937-2007)》(上卷)。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 (1956)。《歷史檔案參考資料》。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
-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資料室 (1961)。《檔案學論文著作目錄》。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
-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教研室編 (1953)。《蘇聯檔案史 (簡明教材)》。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
-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 (1987)。《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校友錄 (1952-1987)》。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
-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資料室 (1986)。《檔案學論著目錄 (1911-1983)》。北京市：檔案出版社。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1987)。《私立崇實檔案函授學生招生簡章緣起》。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民國時期文書工作和檔案工作資料選編 (頁 666-668)》。北京市：檔案出版社。
-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編輯部 (1943)。《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圖書博物學系概況》。《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8(1)，5-6。
- 尹吉星 (2012)。《汪應文圖書館學思想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西南大學，重慶市。
- 毛坤 (2013)。《檔案經營法》。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
- 毛相騫 (2013)。《毛坤先生年譜簡編》。在黨躍武、姚樂野主編，《毛坤先生紀念文集——紀念著名圖書館學家和檔案學家毛坤先生誕辰 110 週年》(頁 253-264)。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
- 毛澤東 (1991)。《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在《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頁 1468-1482)。北京市：人民出版社。
- 王崇生、盧偉 (2007)。《杏壇精英與桃李芬芳》選輯。在江蘇學院校友聯誼會編，《江蘇省立江蘇學院校史》(頁 50)。出版地不詳：江蘇學院校友聯誼會。

- 王景高、馮伯群、李向罡（1993）。*當代中國檔案事業實錄*。北京市：檔案出版社。
- 四川地方誌編纂委員會（2000）。*四川省誌·檔案誌·僑務誌*。成都市：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 吳定、張潤書、陳德禹（1989）。*行政學*。臺北市：國立空中大學。
- 吳寶康、鄒家煒、董儉、周雪恆（1983）。*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工作紀實（1949-1981）*。西寧市：青海人民出版社。
- 沈祖榮（1942）。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近況。*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6(3-4)，7-8。
- 周洪宇（2013）。*不朽的文華——從文華公書林到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2009a）。校聞。在*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編輯，第六冊，頁157-158）（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2009b）。校聞。在*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編輯，第七冊，頁258-259）（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2009c）。校聞。在*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編輯，第七冊，頁427）（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2009d）。校聞。在*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編輯，第七冊，頁567-569）（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校友名錄（1920級-2010級）編委會（2010）。*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校友名錄（1920級-2010級）*。武漢：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 邵金耀（2006）。檔案教育起源探究。*檔案學通訊*，2006(1)，71-74。
- 阿·斯·羅斯諾娃（1955）。國立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院長阿·斯·羅斯諾娃關於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歷史檔案系給吳玉章校長的信。*檔案工作*，1955(5)，34。
- 阿·斯·羅斯諾娃（1958）。國立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工作廿五年。*檔案學研究*，1958(2)，188-222。
- 柯愈春（2009）。追求中國圖書館現代化的思想家徐家麟。*圖書情報知識*，2009，5-16。
- 苦竹齋主（1948）。書林談屑（續）。*上海市立圖書館館刊*，1948(4)，11-17。
- 格·伊·沃爾欽科夫（1956a）。*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部及其他機關、團體、企業活動中所形成的標準檔材料保管期限表（草案）*。北京市：全國檔案工作會議秘書處。
- 格·伊·沃爾欽科夫（1956b）。*中華人民共和國機關、團體、企業檔案室工作通則（草案）*。北京市：全國檔案工作會議秘書處。
- 殷鐘麒（1959）。*國民黨時期檔案管理述要*。北京市：國家檔案局。
- 財團法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2018）。關於基金會。檢自
http://www.chinafound.org.tw/ec99/eshop1387/ShowGoods.asp?category_id=57&parent_id=0
- 馬晴（2015）。*中國檔案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市。
- 張衍（2016）。江蘇學院檔案學教育溯源。*檔案學研究*，2016(1)，51-56。
- 張衍、王梅玲（2016）。中國大陸檔案學碩士教育制度之研究。*圖資與檔案學刊*，8(1)，61-90。
doi:10.6575/JILA.2016.88.04
- 張衍、衛瀟、周毅（2012）。蘇州大學圖書館學專業發展源流探析。*新世紀圖書館*，2012(8)，84-88。
- 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編（1986）。高等教育。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三冊，第五編）（近代中國

- 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一輯)。臺北市：文海。
- 教育部 (1941)。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 28、30 年度畢業生案。(檔號：A309000000E/0029/148.04-10/0001)。檔案管理局，臺北市。
- 梁建洲 (2007)。回頭看看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檔案管理專業教育的貢獻。*圖書情報知識*，2007(1)，99-107。
- 梁建洲 (2013)。毛坤先生編寫《檔案經營法》講義的背景。在黨躍武、姚樂野主編，*毛坤先生紀念文集——紀念著名圖書館學家和檔案學家毛坤先生誕辰 110 週年* (頁 54-57)。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
- 梁建洲、廖洛綱、梁鱸如 (2000)。毛坤圖書館學檔案學文選。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
- 陳國琛 (1946)。文書改革之簡化與管理。臺北市：台灣新生報社。
- 傅振倫 (1994)。六十年檔案工作憶往。在傅振倫文錄類選 (頁 407-410)。北京市：學苑出版社。
- 傅振倫 (1999)。附錄一年表。在傅振倫學述 (林在勇主編，頁 153-162) (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名家學述)。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
- 彭敏惠 (2015a)。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的創建與發展。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
- 彭敏惠 (2015b)。文華圖專師資力量探析和啟示。*圖書情報知識*，2015(5)，39-45。
- 彭敏惠 (2017)。我國檔案教育初創時的難關與突破——以毛坤的《檔案經營法》為視角。*圖書館論壇*，2017(9)，21-26。
- 程桂芬 (1999)。一個老檔案工作者的回憶。北京市：中國檔案出版社。
- 程煥文 (2008)。周連寬先生生平事跡與學術貢獻——《周連寬教授論文集》前言。*圖書情報知識*，2008(1)，105-110。
- 程煥文 (2013)。魂兮歸來——在紀念著名圖書館學家和檔案學家毛坤先生誕辰 110 週年暨圖書館學和檔案學史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在黨躍武、姚樂野主編，*毛坤先生紀念文集——紀念著名圖書館學家和檔案學家毛坤先生誕辰 110 週年* (頁 8-9)。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
- 劉文傑 (1987)。中國檔案學文書學要籍評述 (1910-1986)。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
- 劉勝旗 (1980)。行政管理系簡介。在江蘇學院四十年編輯小組編，*江蘇學院四十年* (頁 42)。臺北市：江蘇省立江蘇學院旅台校友會。
- 鄭海濱 (2001)。民國時期江西檔案教育。*檔案學通訊*，2001(3)，53-55。
- 賴世鶴、田真 (2016)。曾三傳。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
- 謝麗榮、賴世鶴 (2016)。一代宗師——吳寶康。在賴世鶴、田真著，*曾三傳* (頁 294-305)。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
- 韓李敏 (1989a)。陳國琛與民國時期南方三省的文書改革 (一)。*浙江檔案*，1989(2)，17-18。
- 韓李敏 (1989b)。陳國琛與民國時期南方三省的文書改革 (二)。*浙江檔案*，1989(3)，29-30。
- 顧頡剛 (1987)。蘇州史誌筆記。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
- 顧燁青 (2010)。植根民眾教育 造就專業人才——蘇州大學圖書館學教育前身 (1929-1950) 歷史貢獻述評。在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152-163)。南京市：南京大學。
- Stiffler, D. (2010). Three blows of the shoulder pole: Soviet experts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1950-

1957. In Bernstein, T. P. &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pp. 303-326).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Guseva, L. & Makarova, A. (2015). Traditions and modern trends of the Russian and French archival education. *Criar Educação*, 5(1). Retrieved from <http://periodicos.unesc.net/criaredu/article/view/2265/2134>.